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



# 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IES

王也扬 赵庆云 ●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学术史系列



# 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THEORIES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王也扬 赵庆云 ● 编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 / 王也扬, 赵庆云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823 - 1

I. ①当… II. ①王… ②赵… III. ①中国历史—  
近代史—理论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174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插 页 2  
字 数 345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伟光

副主任 蔡 昉（常务） 李培林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 援 王国刚 王建朗 王 巍 邢广程

刘丹青 杨 光 李 平 李汉林 李向阳 李 林

李 周 李培林 李 薇 吴恩远 张宇燕 张顺洪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卓新平 周 弘 郑秉文

房 宁 赵剑英 郝时远 唐绪军 黄 平 黄群慧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蔡 昉 裴长洪 潘家华

总策划 赵剑英

#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变动之中，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这一切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目前面对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素材。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这一号召，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旨在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实施创新工程的目的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成果，多出政治方向正确、学术导向明确、科研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为人民服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实施创新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规律，完善学科建设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结构合理、优势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学科布局。作为创新工程精品成果的展示平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报告的撰写，对于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发展状况、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创新来说，是一项兼具基础性和长远性的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

的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成就显著、举世瞩目。为了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观念、方法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我们亟待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不断总结各学科积累的优秀成果，包括重大学术观点的提出及影响、重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演变、重要学术著作与文献的撰著与出版、重要学术代表人物的涌现与成长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大型连续出版丛书，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分为三个子系列：“当代中国学术史”、“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和“学科年度综述”。“当代中国学术史”涉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语言学等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内容丰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状况。“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按一级学科分类，每三年发布，“学科年度综述”为内部出版物。“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重大理论创新与热点问题，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学科年度综述”内容包括本年度国内外学科发展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热点问题，代表性学者及代表作。每部学科发展报告都应当是反映当代重要学科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脉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性成果；都应当是作者长期以来对学科跟踪研究的辛勤结晶；都应当反映学科最新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该出版工程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系列丛书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史料文献和教学材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王伟光

# 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这对传承我国学术史研究的历史传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吸取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专家学者的建议，经过广泛深入的学术咨询和学术研讨，才确定的重要出版项目。

“报告”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经济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敦煌学、语言学、简帛学等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内容丰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状况。“报告”执笔者均为国内知名的学科带头人，在相关领域有长期深入的研究，这支作者队伍是“报告”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这套“报告”立项的重视。

“报告”包括三部分内容：一、当代中国学术史；二、年度综述；三、前沿报告。最近出版的是当代中国学术史的部分成果，展示了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建设与发展的状况，是对该时期相关学科发展历程与收获的检阅与巡礼，反映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进步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实际上是一部规模恢弘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史，必将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有力促进其繁荣与发展。

二

在我国，学术史撰写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学术”一词，先秦典籍已有（如《礼记》等），有时被简称为“学”，如“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论学取友”（《礼记·学记》）等。“学术”概念的内涵，历来学者们多有探讨。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对“学术”的理解和界定是多元的，很难用一种固定的含义来把握，但是又具有相对稳定和明晰的意义。“学术”自然含有“学”与“术”两方面的内容，用今天话说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作用；“学”与“术”在中国传统学术观念中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被《庄子·天下》称作“道术”。梁启超、钱穆先生各自都撰有学术史著作，其“学术”比较接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某些内容，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观念文化”，涵盖哲学、经学、史学等的思想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梁启超曾在《学与术》一文中，根据体用原则对“学”与“术”的关系作了发挥，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五下），就具有近现代学术的基本风貌和精神，体现了学术史的时代性。

先秦时期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当然，也有学者根据《韩诗外传》所引，认为是《非十子》，如章学诚等）、《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韩非子·显学》等都是我国古代学术史的经典作品。

《庄子》称“道未始有封”（《齐物论》）、“道术无乎不在”（《天下篇》）、“无所不在”（《知北游》），都在强调道具有普遍性和无限性，并且寓于万物中，不能瞬息离开万物。《天下篇》还简明扼要地勾勒了先秦学术史的演变脉络，即“神巫之学”、“史官之学”到“百家之学”的过程，“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分化、发展与演进的史实，即由“官师合一之道”、“官守学业”到“私门著述”（章学诚《校讎通义·原道》）的变化历程。这些论述都具有深邃的学术视野，有助于后人研究先秦时期的学术史。



还有,《荀子·非十二子》集中论述了先秦它器魏牟、陈仲史鳍、墨翟宋钐、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共十二子的学术内容与弊端,表彰仲尼子弓、舜禹之道,主张“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吕氏春秋·不二》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疑应为‘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的学术差异,希望能够从不同的学术见解中找出其相同点。《韩非子·显学》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儒墨两派显学的发展状况,保留了“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儒墨学派演变的资料,为后人研究指出了方向。不过,韩非重点批评的是“愚诬之学”,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强调“参验”的重要性。

从先秦学术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和”是有差别(矛盾)的统一性,而“同”则是无差别的统一性。孔子明确地指出,他自己主张“和”而反对“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学术史要求从不同的学术思想派别中找到它们的统一性,这个目标促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既重视研究事物的相异面,又要找到它们之间的统一性,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史能够持续发展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依据。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从《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开端,分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学术要旨,认为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在分类上,以各家各派的派别名称取代具体的代表人物,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评论褒贬有度,反映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西汉末刘歆《七略》,也是重要的学术史作品,后被吸收进《汉书·艺文志》中。《汉书·艺文志》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曾被清代学者章学诚称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校讎通义·汉志六艺》)。《七略》、《汉书·艺文志》最重学术源流,对后世学术史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正史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儒林传》等包含了丰富的学术史内容,成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从宋代开始,出现了以学派为主的学术史典籍,如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这是学案体学术史的开创之作),明代周汝登《圣学宗传》,明末清初孙奇逢《理学宗传》等,均具备以学派为主勾勒学术思想演

变的雏形。《伊洛渊源录》收录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及程门高足的传记与时人评价，贯穿着洛学学派的学术思想，邵、张仅被视为洛学的羽翼，这一点未必准确。《圣学宗传》欲会通儒释，后被黄宗羲等批评。《理学宗传》虽网罗学派较多，但以程朱、陆王为主贯穿学术史。可见在学术史上真正会通各个学派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

清朝初年，黄宗羲《明儒学案》和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则是学案体学术史的集大成者。《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的成熟的学案体学术思想史著作，侧重分析各家学术观点，“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明儒学案·序》），体例上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案，其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者，总列诸儒之案”（《明儒学案·发凡》），按照人物学术思想异同划分学派归属，处理学案分合。《宋元学案》出于多人之手，经历曲折，但卷帙浩大，资料丰富，注重人物之间的师承关系，并将其作为认定学派的主要依据。这种注重学术宗旨、学派传承的研究方法，对清代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录》等都多有影响。

在我国近代，有些学者自己撰述学术史著作，其中有些成为传世之作，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他们所阐述的“学术”，包含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解，也包括关于现实政治思想的评价等，具有综合性的特色。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学人力图恢复这个传统，在新的起点上进行关于中国学术史著作的撰述。

今天我们看到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已有若干种，有的偏重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的着重典章制度源流演变的探讨，还有的侧重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考察。这些毫无疑问都属于“学术”范畴，从不同的角度和学科去研究具体学科的演变，总结学术经验与教训，为学科学术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 三

我国历史上的学术史传统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结晶和文化宝藏。无论是序跋体、传记体、目录体、笔记体、学案体、章节体、

学术编年体等，中国学术史的优秀传统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1. 重视文献资料考订，坚持“明道之要”的学术原则。学术史著作重视文献资料考订，将学术史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这是学术史研究的基础。前贤在梳理学术史时，除强调实事求是，斟酌取舍，重视无征不信外，还主张“学”与“术”的结合，既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爬梳，又重视文化意义与学术精神的彰显弘扬。这就是学术史著作有关于“明道之要”（《校讎通义·原道》、《校讎通义·补校汉艺文志》）的原因。《明儒学案》主张学术史研究要努力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宏大与无所不包，“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以大海与江河等关系为例：“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明儒学案·序》）江淮河汉虽各有曲折，但都同归于海；学术虽有学派的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

2. 注重学术变迁的源流和发展脉络考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讎通义·焦竑误校汉志》）一直是学术史的传统。如在《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以及《史记》史传作品的影响下，探讨学术流变的传承变化，成为学术史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七略》、《汉志》重学术源流后成为学术史著作的通例。

3. 重视对于学术史中不同学派特色的研究，揭示它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贡献。在对学派学术特色把握的基础上，重视研究不同学派间思想的差异与融合，则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生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争辩交融，汉唐宋元时期儒、道、佛三教的发展与融合，明清时期中学与西学的会通，均深藏着相反而相成的学术精神。清初，黄宗羲、全祖望撰《宋元学案》，以理学家为主干，但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强调不同学派的交流影响，相反相成，正如黄宗羲主张的：“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明儒学案·发凡》）

4. 继往开来，重视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概论》）。不夺人之美，不隐人之善，否则，将被视为“大不德”（《清代学术概论》）。《四库全书总目》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

当时的研究成果，订正某些缺失，提要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学术史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两千多年而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机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著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为民族发展的脊梁，正因为如此，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

5. 学术史带有明显的整体性、综合性、学术性，力求将学术思想、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熔于一炉，避免支离破碎。《庄子·天下》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的作者看到关于天地的整体学术被分裂为各个不同的部分，“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这很有见地。古代因为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学科观念，传统的经史子集提供了更多融通交流的机会和可能，使传统的学术史研究能够注重整体性、综合性、学术性，并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又有很强的时代性。

#### 四

中国古代学术史是我们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在新时代如何吸收其优长，从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出发，不仅看到思想史上学派间的差异，更加着力研究“差异”是如何转化为“融合”、“会通”的。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进行细致的梳理研究，找出“融合”的关节点，以及“会通”与“创新”的关系，也许这是克服学术史研究中某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有效途径，使学术史研究更加具体、实在，逐步接近于学术史的原貌。

中国古代学术史重综合、完整与学术的特征在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虽然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分门别类的研究，当然这是学科分化与发展的标志，但是由此而带来的学科分离与隔绝，则是学者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学科间的会通，是学科发展特别是交叉学科、跨学科、新兴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交流 and 相互借鉴，而且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学科间的交融（交叉融合），为此，可首先从不同学科的学术史研究着手，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史必然与其他学科有关，因此，对于学术史的研究，无疑为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奠定了基础。可喜的是，当代中国学人已成功撰写了不少学术史著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研究成果。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的出版，肯定会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張其成

2010年7月16日

## 序 二

何为中国近代史？这一发问如果是在 20 年前，甚至在 10 年前，回答是不同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起止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在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高校与教科书中，1919 年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终点，那以后的历史被称为“中国现代史”。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把 1840—1949 年间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打破了 1919 年的藩篱。如今，多数人都会同意，中国近代史是 1840—1949 年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时限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反映了人们对“近代”认识的深化。

“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研究，它以对 1840—1949 年间的历史的研究为考察对象，而无论这段历史研究在当时是被称为“近代史研究”，还是“现代史研究”。

民国年间，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经起步，但近代史学科获得迅速发展并成为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在以往学人的认知中，研究距离太近的历史难称学问，因为这一研究既可能包含着执笔人难以摆脱的情感倾向，又受制于历史结果还没有充分显现的现实困境，其研究结果便难以避免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风险。因此，过近的历史是不宜研究的。“厚今薄古”的倡导，改变了这一状况，近代史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空前发展。应该说，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仅是一项人为的政策推动，实际上是适应了一个变动的社会的需求。社会发展对重新解释新近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认识刚刚过去的历史，肯定未来的发展方向。简言之，社会需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踏步发展。

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大致与共和国的发展同步：当社会发展呈现繁荣景象时，学术发展亦呈现勃勃生机；当社会发展遭遇曲折时，学术研究亦出现曲折。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亦大致可以 1978 年为

界，分为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倘若细分，这两个大的时期内又可分为几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此，本丛书并未强求统一，而由各卷根据各自的学科发展特点来做分期研究。

总体而言，在前一阶段，中国近代史学科完成奠基并获得蓬勃发展。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确认，并日益发展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研究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发展过程，建立起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并对近代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展开了实证性研究，形成了近代史研究的初步繁荣景象。

任何学术都难以避免时代的影响。社会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的需求，形成了强大的学科发展推动力，其利弊兼而有之。一方面，它促进了近代史研究的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它的工具性要求，又不可避免地给近代史研究造成了困扰，这种困扰在前17年中便已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其弊端彻底显现。“影射史学”一度使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路线斗争的阐释性工具，沦为空头政治的奴婢，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失去了自己的科学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使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时期，也使近代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解放，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新论新知不断涌现，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大发展，这一发展不仅表现在人们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进程，观念和结论不断更新，还大量表现在对历史细节的还原上，各类史实的更正俯拾皆是。可以说，你很难找到一个原封不动停滞不前的领域。若干史实的重现和基本观念的拨乱反正，大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使人们对于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也大为开阔，由比较偏重政治史的局面，发展成多领域百花盛开的局面，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完整的近代史研究体系。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研究新作迭出；原先基础较薄弱的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有了极大发展；以往几近空白的人口史、灾荒史、观念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在传统学科经历着知识更新的同时，新学科的发展势头迅猛，近代史研究整体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人们的思想解放，也得益于对外学术交流的拓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社会发展的重

途径，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书本中的世界，造就了健康的理性的平等的世界观。人们不再一概以戒惧之心看待海外学术，而是以开放的胸怀取其精华。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缩小了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正所谓：“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因包容而发展”，诚哉斯言！

我们看到，学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绝不是被动的单向影响，而是互有影响互为促进。一方面，社会发展不断向学术研究提出新的命题，无论人们赞成与否，社会热点与需求总是要反映到学术研究中来；另一方面，学术研究的成果又影响了社会的认识。即使是一些在某些方面领先或超越了社会认识的成果，起初或许不能为社会所理解所接受，但数年或若干年后，它们逐渐为社会接受，成为社会认识，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代史研究中并不少见。

常有人感叹，今日之研究再无往日之“大师”再现。也有人忧虑，史学的“碎片化”及“多元化”正侵蚀着学科的发展。我以为，尽管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但却不必过于忧虑。或许是学科分工的过于精细，今日已很少得见过去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大师，然而，与往日相比，更多的更为精深的研究在今天并不少见。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会有谬误的存在，也会有“无意义的碎片”的存在。正是在不断的切磋与争论中，谬误得以纠正，碎片得以扬弃与整合，科学得以向前推进。以此而观，今天的近代史研究仍然行进在健康发展的道路上，仍处于繁荣与可持续发展期。

史学的繁荣，并不在于观念或结论的一统，而恰恰在于学术论争所呈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倡行。关于这一点，有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论争颇具典型意义。尽管两种范式的论争并没有结束，也很难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对于历史的观察也应该是多视角多方位的，不必以一个范式否定另一个范式，实际上也不可能以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不同范式的相互补充与共存，则更能展现历史的多重面相。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讨论，对近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近代史研究。

正如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只是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更为长远的是体现在人的思想变革上一样，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不仅是体现在科研成



果的数量丰富上，这是外在的、有形的，而更为长远的无形的变化是，人们摒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更为宽容的态度来从事研究，以平等的态度来进行学术对话。这一思想方式的变化，影响深远，是近代史研究得以持续发展的长久性的保证。

知识的发展总是在前人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学便是一门立于巨人肩膀之上的学问。近代史研究也是如此，它是在不断的积累和更新中发展的，今天的成就是一代代学者努力的结果。为进一步推动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回顾建国以来近代史研究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过程，把握学科的前沿动态，由此而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2012年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郭沂纹等诸位先生的积极推动下，近代史研究所启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的撰写工作，于今已三年有余。

本丛书按专题分卷，分别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当代中国民国政治史研究》《当代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当代中国革命史研究》《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当代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当代中国近代史料学的轨迹和成果》《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另有《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卷，计16卷。

这些专题涵盖了近代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本所各研究室（编辑部）负责人及资深学者分别担纲相关各卷，全所同事广泛参与。杜继东及科研处的同事们承担了丛书的繁琐的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承担了繁重的编校工作。在此，谨向为本丛书撰写和出版付出各种努力的同事们朋友们致以谢意。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甚感仓促，丛书中各种疏漏定然难免，我们期待着学界同行的指正。因受本所学科构成所限，丛书16卷并不能覆盖近代史研究的所有重要领域。我们设想，待未来时机成熟时，我们将邀请所外学者来共同参与这一工作，以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前沿报告系列。

王建朗

2015年11月19日